

全球发展倡议:促进共同发展的国际公共产品

王镭*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摘要: 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发展事业面临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以“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共同发展指明方向。全球发展倡议源自中国、属于世界,是促进共同发展的国际公共产品,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提出全球发展倡议顺应人类历史发展大势,超越霸权稳定论局限、打破“搭便车”魔咒禁锢、秉持正确义利观,在对国际公共产品的理论认知上实现突破与创新。全球发展倡议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绿色与创新基本原则,既应对紧迫挑战,又注重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支撑条件,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提供了系统性、整体性方案。通过国际合作多种路径推进实施,全球发展倡议必将凝聚全球发展共识,增添全球发展动力,为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 全球发展倡议 共同发展 国际公共产品

JEL 分类号: F02, H87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共振,全球发展进程面临严峻挑战。2021年9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以“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将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作为重点合作领域,提出合作设想和方案,旨在动员国际社会形成合力,助力落实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全球发展倡议表达了当前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推进全球发展事业的殷切期盼,为全球共同发展指明方向,得到积极、广泛响应,已有100多个国家表达支持,50多个国家加入中方在联合国平台成立的“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¹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具有其历史必然性、理论创新性、现实紧迫性,源自中国、属于世界,是破解发展难题的中国方案,更是促进共同发展的国际公共产品,将凝聚全球发展共识,增添全球发展动力,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 联系人: 王镭, 邮箱: wanglei@cass.org.cn.

¹ 王毅: 全球发展倡议得到各方广泛支持,

https://www.fmprc.gov.cn/wjdt_674879/wjbxw_674885/202204/t20220425_10673290.shtml.

一、全球发展倡议:三重逻辑视角下的国际公共产品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在全球发展事业面临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提供重要国际公共产品。这是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时代之问的应答,内在具有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的坚实支撑,也因此具有深刻的合理性和广阔的实践前景。

(一) 全球发展倡议的历史逻辑

今天的时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时代,即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交往和分工的普遍发展,进而个体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并越来越“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2012)。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中,受生产力水平的局限,人类历史总体处于封闭状态。发展到封建社会,封建经济仍属于自然经济,决定了人类历史尚未从民族性、地方性的历史转向普遍性、世界性的历史。随着资本主义时代从16世纪开启,历经新航路开辟以及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分工迅速发展,在广泛社会分工基础上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从而形成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将各个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于沛,2019)。当今世界正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新的通信和运输技术快速发展,货物、服务资本和就业等跨国界流动的交易成本显著降低,全球化流动的收益水平大幅提升,进一步压缩了世界的时空,全球化进程加速向前,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各国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割的整体。

人类历史演变的总趋势表明,生产力水平与交往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交往不断扩大,人类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人类历史从地域性演变为全球性,人类命运日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关于“世界历史”的唯物史观为根基,中国顺应人类历史发展大势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这一促进全球发展事业的国际公共产品也因此彰显着历史必然性、合理性。

(二) 全球发展倡议的理论逻辑

萨缪尔森在1954年就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产品”概念,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有关公共产品的讨论仍主要局限于国家层面。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国际公共经济学日趋发展起来,国际公共产品也才逐步成为日益受到关注的研究议题。金德尔伯格、克拉斯纳、吉尔平等都曾在其论著中谈及霸权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关系(张克中,2020)。统观西方有关国际公共产品的理论探讨,一般侧重于从霸权稳定视角讨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将“搭便车”视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核心症结,难以摆脱利益零和思维的束缚。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则体现出在国际公共产品理论认知上的突破与创新。

一是超越霸权稳定论局限。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须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其他国家消费,以确保国际体系稳定。基于霸权稳定论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难以克服供给国维护霸权初衷与公共产品具备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属性之间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表征为霸权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往往限于俱乐部式的公共产品,存在供给国将其私物化倾向,公共产品成为维护霸权收益的工具乃至打压他者的武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以谋求发展而非维系霸权为目的参与国际事务,提供国际公共产

品的初衷在于实现自身发展与外国发展相统一,即实现共同发展,落脚于各国总福利的提高而非维护霸权利益,实现了对以往霸权稳定论基础上国际公共产品认知的超越。

二是打破“搭便车”魔咒禁锢。经济学中的“搭便车”,是指不承担任何成本消费公共物品的行为。由于存在“搭便车”问题,缺少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的激励,在一国内需要政府来提供这种物品。由于不存在超越国家的世界政府,“搭便车”成为困扰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魔咒,“搭便车”问题一般被认为是构成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深层原因。2014年8月22日,习近平主席访问蒙古国时指出,“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²这一重要论述,彰显了中国面向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国家之间“搭车”行为的全新认识和解读,即不是从狭隘的获利和给予的对立角度来理解,而是将国家之间的“搭车”视为一种互利互惠行为。以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突破“搭便车”局限思维。欢迎“搭车”的中国理念,打破了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意愿的禁锢,极大拓展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可能空间。

三是秉持正确义利观。2014年,针对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导向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明确提出,“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真正做到弘义融利”(习近平,2018)。正确义利观强调处理好道义与利益的关系,要求将不损害他人利益作为谋利的提前条件。早在2500多年前,中国的先哲孔子就提出“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这一主张也被称为“立己达人”,是儒家“仁”“恕”思想的集中体现,强调仁爱待人、推己及人,为如何处理自身与他人关系树立了行为准则。“立己达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帕累托最优”原则内在相通,指向在不使任何一方利益变坏前提下实现各方利益的共同提高。正确义利观是对中国“立己达人”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超越了狭隘的经济理性认知,使国际公共产品的公益性得以确证,为国际公共产品应对个体理性行为导致的合成谬误、有效发挥其弥补市场缺陷的功能开辟了道路。正确义利观本身作为一种价值层面的公共产品,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确定国际发展合作的行动方案奠定了理论根基。

(三) 全球发展倡议的现实逻辑

增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符合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当今,全球发展进程遭受严重冲击,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紧迫性更为凸显。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全球发展进程。2022年4月,联合国亚太地区经济社会委员会、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发布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发展进程3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亚太地区极端贫困人口20年来首次增加,近9000万人可能陷入极端贫困。发展中经济体2020年就业岗位减少1.09亿至1.66亿个。³疫情的全球性蔓延从供需两端冲击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受阻,世界陷入增长与发展困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下降超过1/3,降至1万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投资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⁴联合国近期发布的《工业化对世界人

² 习近平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的演讲, http://www.gov.cn/govweb/xinwen/2014-08/22/content_2738562.htm。

³ 刘慧:国际机构联合发布报告呼吁:加快推动亚太地区包容可持续发展,《人民日报》,2022年4月7日。

⁴ 王新萍等:推动发展融资 促进全球发展,《人民日报》,2022年4月14日。

民福祉的重要意义》报告指出,由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持续影响,最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增长近乎停滞,与已实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差距会进一步拉大。⁵疫情中各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全球紧密关联,全球发展重拾信心和势能离不开国际团结协作。

二是地缘政治安全冲突显著拖累世界经济增长。俄乌冲突已成为“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安全危机,显现出严重外溢效应,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2022年4月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相较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面临更大经济减速。4月8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世界粮食商品价格大幅跃升至历史最高水平。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国际食品和能源重要供应方,燃料和粮食价格的迅速上涨,将使低收入国家及民众中的弱势群体遭受最大打击。俄乌冲突直接冲击着全球稳定和几十亿人民的生产生活,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国际社会安全与发展两大主题密切相关、密不可分。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协同驱动世界和平发展。

三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阻碍全球发展事业。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部复杂精巧、有机一体的机器,拆掉一个零部件就会使整个机器运转面临严重困难,被拆的人会受损,拆的人也会受损。”⁶国际社会,某些国家为一己之私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挑动对抗,滥施制裁,其政策措施外溢效应令本已低迷乏力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事实经验表明,对抗冲突没有赢家,从开放包容向封闭孤立倒退,将导致财富增长水平降低,减弱全球发展动能。全球发展倡议在全球化遭遇逆风中,为全球发展事业注入了稳定性和正能量。

二、全球发展倡议:理念、原则与行动相统一的国际公共产品

国际公共产品因其不同形态可呈现为思想层面的国际公共产品和行动层面的国际公共产品。从思想层面看,全球发展倡议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和绿色与创新原则,为全球发展事业谋定前行航向,注入思想动力;从行动层面看,全球发展倡议明确重点领域,为推进全球发展进程指明优先选项,增添物质力量。全球发展倡议作为理念、原则与行动相统一的国际公共产品,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提供了系统化、整体性方案。

(一)核心理念:以人民为中心

唯物史观认为,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建立起来,作为“交往主体”的人的素质也在与世界历史相适应的过程中得到全面提高(于沛,2019)。顺应人类社会历史大趋势,发展的最终归宿应当也只能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唯物史观为指引,全球发展倡议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核心理念。以此为

⁵ 俞懿春等:助力发展中国国家工业化进程,《人民日报》,2022年4月22日。

⁶ 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jzg_673183/xws_674681/xgxw_674683/202204/t20220421_10671053.shtml。

核心理念,就是将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为此,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的包容性、普惠性,要求在全球发展中不让任何一国、任何一人掉队,要求在全球治理中保障各国人民在发展过程中享有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力公平,增强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构建共同创造人类社会财富、共同分享发展成果的人类发展命运共同体。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单纯以资本增值的逻辑看待发展,任凭种种经济理性行为的负外部性泛滥,这样必然导致贫富分化、环境恶化、国际社会不公正不合理不安全加剧等种种弊端。

(二) 基本原则

随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演变,人类文明走向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绿色是可持续发展的鲜明标识,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量;绿色与创新浑然不可分离,失去绿色则发展就丧失可持续的属性,没有创新则发展就获得不了可持续的动力。全球发展倡议将绿色和创新视为国际可持续发展合作的底色,作为两项基本原则,贯穿于倡议实施各领域全过程。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工业化迅猛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生态系统的循环与平衡遭到破坏,人类遭到自然的报复。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关乎人类文明兴衰与未来,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从根本上回答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否定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观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二者辩证统一起来,指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要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习近平,2022)。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向世界介绍中国生态文明理念与行动。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全球发展倡议长远考虑人类未来与福祉提出的重大原则,成为人类共同建设地球绿色家园的思想公共产品。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辩证统一、相辅相成,才能实现更安全、可持续的发展;在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中寻找发展机遇和动力,才能实现更加强健、更高质量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相统一的文明发展道路。

2. 创新驱动

世界各国在谋求发展中都无法回避投入与产出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一方面,生产的资源约束日趋增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另一方面,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升,需要产出水平随之提高。解决投入产出两端之间的矛盾,必然要求走创新驱动之路。只有靠科技进步,提升生产效率,实现生产力曲线的推高,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加强互联网、大数据、5G、人工职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挖掘疫后经济复苏新动能,加快全球发展进程,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 重点行动领域

全球发展倡议明确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8大重点合作领域,面向弥合南北“发展鸿沟”,既着力应对紧迫挑战,又着眼增强发展能力、创造发展条件,全面推进全球发展进程。8大重点领域的公共产品需求大、溢出效应强,采取务实行动将有效提振疫后经济复苏,加快实现2030年议程目标。

1. 应对紧迫挑战,聚焦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三大任务

(1) **减贫**。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全球绝对贫困标准衡量,中国40年来贫困人口减少近8亿,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近75%(财政部等,2022)。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中国提前10年完成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

“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被列为首要目标,全球发展倡议也将减贫置于重点合作领域的首位,彰显了其“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中国在其成功的减贫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作为公共产品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参考借鉴。同时,作为国际减贫事业的推动者、贡献者,中国坚持行动导向,为各国减贫提供实实在在的助力。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预期帮助全球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肖新新,2022)。

(2) **粮食安全**。中国谚语说“民以食为天”。粮食是维系人生命和一切生产生活活动的物质基础,粮食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2021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近1/3人口无法获得充足食物,人数比上一年增加3.2亿人(曲松等,2022)。疫情、气候变化、地缘安全冲突等使世界粮食供给更为脆弱。同时,大国退出量化宽松、加息等宏观政策外溢,导致大宗商品期货投机炒作加剧,国际市场粮价上涨。保障粮食安全,一方面要求提高供给水平,另一方面需要改善国际治理,稳定粮食价格,确保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困国家的粮食可负担性。

全球发展倡议将粮食安全作为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列入重要合作领域,强调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构建公平合理、持续稳定的农业贸易秩序,完善国际粮农治理,维护全球粮食安全。截至2021年12月,中国已向7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2000多名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培训近10万名农户;在作物生产、畜牧业水产养殖、农田水利、农产品加工等领域,中国已向多国进行1500多项技术推广和示范,带动项目区平均增产40%~70%;中国杂交水稻已在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推广种植,年增产稻谷可多养活数千万人(肖新新,2022)。中国主张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稳定国际粮价波动。同时,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加入WTO以来取消相关农产品进口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让世界分享中国巨大的粮食市场机遇,提升世界粮食市场供需均衡水平。

(3) **抗疫和疫苗**。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而至、反复延宕,给人类带来罕见的严重冲击。一些国家因疫返贫、因疫生乱,大量人口陷入生活困境,当今世界发展的脆弱性、各国应对灾疫能力的不平衡性由此凸显。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非洲大陆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率仅有7%;世卫组织194个会员国中,仍有36个疫苗接种率不足10%,88个会员国不足40%(杨一,2022)。

全球发展倡议将抗疫和疫苗作为重点合作领域,体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中国是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迄今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供应超过21亿剂疫苗。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支持启动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在缅甸、塞尔维亚等国合作生产疫苗满足当地需求,与180个国家、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并向有疫苗合作需求的国家提供相应技术支持(杨一,2022)。中国通过深化国际抗疫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构筑卫生安全屏障。

2. 增强发展能力,紧扣气候变化、工业化、数字经济三大主题

(1) **气候变化**。将人类活动的污染排放控制在地球生态系统的自净化能力范围内,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才能保持完好性和稳定性,人类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基本前提。工业化以来人类污染排放的积累导致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也就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项根本性任务。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体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中国将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中国将减碳作为一种“倒逼”动力,从依靠资源要素投入扩张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实现增长。中国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系统,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闻言,2022)。2011年以来,中国累计安排约12亿元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为近120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约2000名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杨迅等,2022),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赢。

(2) **工业化**。工业化与实现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从中国经验看,中国东部沿海和中部省份经济相对发达,也是中国制造产业主要聚集的区域;伴随中国经济整体发展进程,制造产业呈现从东部向中部和西部省份转移的趋势。从全球经验看,欧美是早期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二战”后欧美德日逐步演变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梯队、“亚洲四小龙”成为第二梯队;21世纪以来,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成为“世界工厂”,且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逐步向上攀升(倪红福、田野,2022)。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八项目标确定为“促进持久、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促进实现充分和生产性就业及人人有体面的工作”,体现了以工业化带动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内在要求。发展中国家各自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不同,其推进工业化进程不意味着都要形成自身完整的工业化体系,而是要结合自身实际,发展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当今世界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化,全球产业链面临变革重组,发展中国家应当在变局中加快工业化步伐,更好嵌入全球和区域价值链、供应链,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和动能;同时,随着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加入,全球和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将获得更强韧性,增强世界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全球发展倡议积极助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2021年12月,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宣布未来3年将推动企业对非洲投资总额不少于100亿美元,设立“中非民间投资促进平台”,援助非洲实施10个工业化和就业促进项目。在《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2~2024)》中,确定中

拉将加强工业政策交流,深化在原材料、装备制造、绿色低碳产业、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的合作,推动中拉产业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俞懿春等,2022)。

(3) **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正在塑造全球经济的新格局,引领着全球经济未来发展方向。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显示,2020年,全球数字经济生产总值达到32.06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为43.7%,其中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增加值为24.4万亿美元。中美之间数字经济规模差距从2018年的7.61万亿美元扩大到2020年的8.2万亿美元(倪红福,田野,2022)。数字经济一方面给经济发展增添巨大动能;另一方面,限于技术、资本、人才、标准等约束,发达国家占有数字经济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则面临发展数字经济严峻挑战,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数字安全、数字治理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消除数字鸿沟、技术鸿沟,实现全球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

全球发展倡议将数字经济列为重点合作领域,意在助力发展中国家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获得更大的发展潜力和韧性。2021年8月,中国宣布《中非数字创新伙伴计划》,促进非洲数字经济赋能。中国企业利用各类资金已帮助非洲国家新增和升级通讯骨干网15万公里,网络服务覆盖近7亿用户终端(杜华斌,2021)。2022年1月,第二次中国—东盟数字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落实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2021~2025)》,就加强数字政策对接、新兴技术、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数字安全、数字能力建设合作等达成共识。中国以务实行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数字经济。通过拓展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改善合作方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增强发展能力,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3. 创造支撑条件,着力发展筹资、互联互通两大抓手

(1) **发展筹资**。资金缺口是长期以来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融资鸿沟”掣肘全球发展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融资需求巨大,国际社会每年需要5万亿~7万亿美元的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健康、教育、道路、电力等方面的资金缺口每年约为2.6万亿美元(王新萍等,2022)。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削弱了其融资能力。联合国《2022年可持续发展融资报告——弥合融资鸿沟》指出,平均而言,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支付收入的14%作为债务利息,这几乎是发达国家的4倍(李学军,2022)。富裕国家能够以超低利率借贷,有力支持其经济复苏。但最贫穷国家需以高成本偿还债务,减少了其用于发展的投资。破解发展中国家融资难题,迫切需要国际公共产品提供助力。

全球发展强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好融资条件,增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和发展可持续性。2013年10月,中国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2016年1月亚投行开业。这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提供国际筹资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措。截至2022年4月,亚投行已批准147个项目,累计投资总额超过289.7亿美元(王新萍等,2022)。其对发展中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支持,缩小了区域内不同国家发展差距,也推动了区域经济贸易合作。此外,中国积极通过双边渠道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项目融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03亿美元,同比增长14.1%(王新萍等,2022)。广大发展中国家从中国的资金支持中受益,中国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融资和投资来源。

(2) **互联互通**。“要想富先修路”是中国老百姓从自身经历的经济变迁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经验。

道路从物理形态上讲,属于基础设施,是经济运行发展的物质条件;从经济学角度看,属于交易行为的媒介,便捷的道路条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互联互通不仅包括有形的基础设施硬联通,也涵盖无形的制度层面软联通,后者亦能带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产出效率的效应。

全球发展倡议将互联互通作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在共建“一带一路”中,中老铁路、蒙内铁路、亚吉铁路等开通运营,中欧班列增开提速,东南亚最长跨海大桥——淡布隆大桥正式通车,塞匈铁路、亚万高铁、比雷埃夫斯港、瓜达尔港等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在致力于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同时,将加强政策、规则和标准的软联通置于重要位置。中国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通过促进世界“硬”“软”两方面互联互通,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安全稳定水平,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条件。

三、全球发展倡议:在国际合作中构建发展命运共同体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通过多种路径的国际合作得以实现。全球发展倡议主张深化南南合作,加强南北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增强双边和区域合作机制,践行多边主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打造汇聚各方力量的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以更完善的全球治理与更有效的国际合作推动全球发展。

(一) 加强南南、南北合作,打造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全球发展事业需要以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为依托来推进。通过深化南南合作、提升南北合作,携手营造开放联动的全球发展环境,推动实现更加包容普惠、平等均衡的发展。一是**深化南南合作**。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共同的发展需求。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推进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地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中国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与10多个国际组织密切合作,已经在50多个国家实施100余个发展合作项目,超过2000万人受益(肖新新,2022)。中国宣布未来3年内再提供3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免除有关发展中国家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力争到2030年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增资至120亿美元(王新萍等,2022)。二是**推进南北合作**。中国主张加强南北对话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让各国和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机遇、发展成果,反对恃强凌弱、以邻为壑。2021年末以来,美国为控制本国通胀启动连续大力度加息,诱使国际资本流向美国,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资本收支恶化,面临严重货币贬值压力,凸显出加强南北协调合作,构建全球性经济金融安全网的必要性。中国主张加强宏观政策国际协调,发达国家特别是主要大国,应当承担维护世界经济稳定的责任。针对应对气候变化,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在环境问题上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能力存在差异,要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公平公正,形成各尽所能的气候治理新体系。中国积极推动南北务实合作。设立“中国—国际农发基金南南及三方合作基金”,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在30多个国家开展农村减贫和发展项目等(肖新新,2022)。

（二）依托双边区域机制，加强重大发展战略协同

中国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不断扩大市场准入，维护公平竞争，依托双边和区域机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增添动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菲律宾“大建特建”规划、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埃及“2030愿景”等多国发展规划对接，同时与东盟、非盟、欧盟、拉共体等区域组织发展规划协调对接，寻求优势互补，实现合作共赢。在中国积极参与和大力推动下，2022年1月1日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落地，推动亚洲形成更加开放的大市场，促进亚洲乃至世界经贸和投资进一步增长，有效助推全球发展进程。

（三）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凝聚国际发展事业合力

中国主张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其核心在于坚持开放包容、协商合作、谋互利共赢，反对封闭排他、冲突对抗、图一己之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旨意与国际公共产品非排他性、非竞争属性内在一致，是实施全球发展倡议中应有之义，有利于为国际发展事业汇聚力。一是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支持发挥联合国在国际发展事业中的引领作用。中国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积极响应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发展倡议8大重点行动领域全面呼应2030年议程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实现2030年目标的有力助推器。二是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营造有利于全球发展事业的国际经贸制度环境。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有效性受到严峻挑战。美国阻止WTO上诉机构法官任命，将WTO运行至于瘫痪风险中，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陷入危机。多边贸易体制对于维系各国在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分工交换具有基础性价值，是以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促进全球发展和福利提升的基础性轨道。中国支持与时俱进推进WTO改革，但反对个别国家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做法，主张通过协商对话解决问题。强调在改革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原则”，有效维护发展中国家在WTO框架内的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反对引入针对特定国家的歧视性规则，避免多边贸易机制沦为打压特定对象的工具。三是要发挥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协同效应，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国际发展事业。各种多边机制是全球治理相关方表达和协调利益、采取共同行动的平台。在数字经济、能源转型、网络安全、国际税收、人道主义、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国际社会面对一系列重大议题，在相关全球治理实践中，各个多边平台各有特色和优势。全球发展倡议注重与各多边平台互动联动，着重促进规则、标准以及宏观政策的联通，打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堵点，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机制。

四、结语

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发展事业面临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为推进全球发展进程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提出全球发展倡议顺应人类历史发展大势，超越霸权稳定论局限、打破“搭便车”魔咒禁锢、秉持正确义利观，在对国际公共产品的理论认知上实现突破与创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地缘

政治安全冲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等,严重阻碍全球发展进程,更加凸显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性、迫切性。倡导以人民为中心核心理念、绿色与创新基本原则,既应对紧迫挑战,又注重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支撑条件,全球发展倡议作为理念、原则与行动相统一的国际公共产品,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提供了系统性、整体性方案。通过国际合作多种路径推进实施,全球发展倡议必将促进汇聚全球发展合力,为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2022,《中国减贫40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
- [2] 杜华斌,2021,《中非合作助力 非洲数字经济有望迎来新发展》,《科技日报》12月6日。
- [3] 李学军,2022,《全球可持续发展需弥合“融资鸿沟”》,《经济日报》4月19日。
- [4] 马克思、恩格斯,2012,《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 [5] 倪红福、田野,2022,《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重构》,《中国经济学人》第1期。
- [6] 曲颂、屈佩、谢亚宏,2022,《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积极力量》,《人民日报》4月8日。
- [7] 王新萍、张矜若、毕梦瀛,2022,《推动发展筹资 促进全球发展》,《人民日报》4月14日。
- [8] 闻言,2022,《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根本遵循》,《人民日报》4月7日。
- [9] 习近平,2018,《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
- [10] 习近平,2022,《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央文献出版社。
- [11] 肖新新,2022,《合力建设远离贫困、共同发展的美好世界》,《人民日报》4月6日。
- [12] 杨迅、刘玲玲、任皓宇,2022,《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人民日报》4月16日。
- [13] 杨一,2022,《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人民日报》4月12日。
- [14] 于沛,2019,《从大历史观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求是》第3期。
- [15] 俞懿春、谢佳宁、李欣怡、周轶,2022,《助力发展中国国家工业化进程》,《人民日报》4月22日。
- [16] 张克中,2020,《全球公共经济学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第5期。